一、亚太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劳动市场的特点

“新兴工业国”是70年代末以来广为流行的一个概念。1979年6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新兴工业国的冲击》报告书里,首次将1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定名为‘新兴工业国”。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亚洲的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南斯拉夫。

“新兴工业国”的概念一般包含4层含义:

(1)它是特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3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借助新的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已经从低所得国家跃入中所得国家,与先进工业国的经济差距趋于缩小。

(3)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就业结构变化显著,以机电工业为代表的制造业在国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社会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加快。

(4)在出口总额中制成品比重增加，初级产品比重减少，形成了主要依靠制成品出口的局面。

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确认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又发生了重大改变，10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分化。整个 80 年代，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或低速增长的困境之中，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由于政治剧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拉丁美洲的经济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非洲的经济被描绘为“悲惨的十年”。一些新兴工业国(地区)因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而相继落伍，另一些由于陷入债务危机而举步维艰，唯有西太平洋沿岸的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经济实际增长率不仅居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首，也大大超越了世界平均增长水平。80 年代，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 2.9%，“四小龙”却高达 7.9%，为世界年均增长速度的 2.7 倍。进入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继续呈现低速增长，1990～1992 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仅为 0.8%，而“四小龙”经济依然充满了巨大活力，同期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 6%，为世界年均增长速度的 7.7 倍。继 1989 年香港和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之后，1992 年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突破了 1 万美元大关。这一

国际上罕见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小龙’在短短 20 多年时间里就脱离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而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由此人们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与战后联邦德国的振兴、日本经济的起飞共称为 20 世纪后半期世界的 3 个‘经济奇迹’。

“四小龙”的成功产生了广泛的热效应,人们在惊叹其斐然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探寻其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奥秘。

1. 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一些国外学者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依据现代化起步的时宜性,将各个国家划分为‘早发展国家’与‘迟发展国家”两种发展类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先后次序不同,对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有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迟发展国家,面临着早发展国家起步时期不曾有过的特殊历史条件,而这些变化对当今迟发展国家构成巨大的外部压力,并且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造成‘迟发展效果”。

作为迟发展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相互关联的劣势:

(1)劳动就业的巨大压力。根据西方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量小于平均产出量的劳

动力被称之为‘过剩劳动力’,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量为零的劳动力被称之为“剩余劳动力”。在前工业化时期,由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人口实际增长十分缓慢。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人口实际增长率约为1%强,人口增长同工业化及其城市化的进程大体是协调的,早发展国家在经济起步过程中基本不存在人口压力。只是到后来,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才出现相对人口过剩的社会问题。但是,在战后迟发展国家经济起步阶段,人口增长的速度空前提高,每年净增的规模惊人的巨大。据联合国《人口年鉴》统计,1950～198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9%,世界总人口由战后的22亿增至1987年的50亿。目前世界人口年均净增约8500万。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仅为0.1～0.9%,实际已进入人口静止状态;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则高达2%以上,属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当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时,就不仅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而且会产生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人口增长模型:若人口增长速度限制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比率低于人口增长率,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经济发展便会落入“人口陷阱”,除非有大规模的投资使总收入迅猛提高到一个高水平,否则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社会将始终处于巨大

的就业压力和贫困压力之下。

(2)资本短缺的严重制约。在不少发展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是资本投入，劳动力被吸纳的数量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的规模，因而资本紧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造成资本紧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从资本供给方面看，由于失业和贫困，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不足，导致资本短缺 从资本需求方面看,因收入水平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欲望低下。由此形成了纳克斯所描述的‘ 贫困的恶性循环 ’和利本斯坦的‘ 低水平陷阱 ”,即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低储蓄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紧缺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引起投资引诱不足，投资欲望低下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两个循环相互影响，使经济进一步恶化。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森斯坦的大力推进理论则进一步论证了打破循环求得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本的不断形成和全面地、大规模地投入资本。但是，战后发展中国家为走出“ 贫困的恶性循环 ”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同样是十分苛刻的。这是因为：①新独立的迟发展国家不可能再像早发展国家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掠夺，依靠剥夺其他落后民族的发展权乃至生存权的方式来积累工业化资金，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国内投资。②依靠自身力量，循序渐进地按常规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将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由于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掠夺，迟发展国家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生产剩余主要由粮食构成，资本形成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不断地为那些脱离粮食生产的工人提供食物，并使他们从事资本品生产，以此作为储蓄并形成投资，来进行资本积累而不致缩减消费的过程。这种低水平积累决定了大规模筹措建设资金将是一个长时期才能完成的任务。③为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必须采取超常规方式，走提高积累率和利用外资的道路。这既要强制改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直接抑制公众的消费需求，又要承担吸收外资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从而使经济在起步阶段就潜伏着矛盾和危机。

作为迟发展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现代化起步阶段还具有一定‘ 后起者优势 ”,这主要表现在：

(1)50 年代至 70 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黄金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 30 年代大危机和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进入加速增长阶段,国际市场容量相对扩大,贸易壁垒逐步减少,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际市场，缓解国内日趋沉重的失业压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2)始于 40 年代的第 3 次科学技术革命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由现代科技进步导致的以信息经济为特征的高技术化和服务化，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因。发达国家为了追逐更高的附加

价值，竞相将传统的原材料工业和一般加工工业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以便使自己的经济更多地集中于发展新兴的产业部门，特别是技术和知识密集的产业部门。这一国际产业分布的调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促进其产业结构成长的机会，它们有可能接过仍具市场容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填补因发达国家退出而产生的世界经济空隙，参与不同层次的国际社会分工，获得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的好处。

(3)随着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国际分工愈益专门化，资本国际化的步伐加快，大量资金充斥国际市场，在各国和各地区之间频繁流动，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这为发展中国家在内部积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助于吸收外资筹集建设资金，加速现代经济增长进程提供了可能。

总的来说，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迟发展国家，其经济起飞面临着与早发展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劣势与优势并存，挑战与机遇共生，哪一个国家能够把握机会实现经济跨越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利用后起优势而避开劣势，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及改善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础性条件。

“ 四小龙 ”深谙‘ 机不可失,时不待我 ’的道理,它们紧紧把握住发展机遇，积极分享国际产业分布调整的成果，善于审时度势和扬长避短，实施既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而又符合本国或地区实际的发展战略，终于获得

成功。

“四小龙”曾经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 地域狭小、人口稠密、资源匮乏、资金短缺。50 年代至 60 年代前期，为了优先保证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先后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即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取代外国进口产品，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并逐步实现工业化。这一时期,无论是前期的消费品进口替代,还是后期的生产资料进口替代，都是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为条件，通过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或地区内幼稚工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就业增长率的提高。

60 年代至 70 年代“四小龙”逐步转向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即优先发展出口产品生产，以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战略转换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相对狭小的内部市场已经越来越难以容纳迅速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需要开拓新的市场来释放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二是世界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中，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传统工业向外转移，其国内市场所需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按照动态比较利益原则“四小龙”及时形成了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进国内或地区内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发海外市场“四小龙”吸收了巨额资金，引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学会了科学管理方式，并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在挤占国际市场

中连连得手。产品销售市场的不断拓展带动了国内就业市场的扩大，就业增长率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持续提高。

进入 80 年代后,由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步伐加快，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四小龙 ”内部劳动力短缺,劳动成本上升。为了谋求经济进一步发展，它们加紧调整发展战略,推进经济重组,实施科技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带动工业升级，形成以工业、贸易、金融、服务等为支柱的多元化经济结构,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国际化。通过经济调整转型，它们改变了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增强了竞争实力，适应了以科技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战后“;四小龙 ”在外向型经济的总体发展战略指导下，先后实施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和科技化、多元化、国际化战略,实现了经济起飞。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正确的发展战略为经济成长确定适宜的方式，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奇迹。

2.“二元结构模式”的转变

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不仅会受到人口上升的‘ 劳动力剩余性 ’的压力,还要受到“ 二元经济 ”结构的制约。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把二元经

济结构概括为两大部门：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传统部门有 4 个特征：①它比现代部门要庞大许多；②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或微不足道,或是零,甚至可能为负数；③传统部门实行制度工资，这种工资既是传统部门的人均产品，又是维持传统部门劳动者生活的最低水准；④这个部门只有劳动力剩余而无经济剩余，因而是维持生计部门。与传统部门相对应,现代部门的特征是：①它十分弱小；②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或等于工资，从而这一部门存在经济剩余；③现代部门的工资高于传统部门，但其特点是不变工资，这是因为按照这一工资水准，存在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④现代部门存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这驱使资本家把经济剩余最大限度地用于资本积累。刘易斯认为,由于两大部门工资的差别,会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加之资本家把经济剩余转化为资本的行为，造成了现代部门进一步吸收劳动力的能力。

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克服了刘易斯忽视农业的缺陷。他们认为，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不断地把隐蔽性失业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配置到工业部门，使经济的重心从农业逐步转向工业。发展成功的标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否产生一种“推力”,使相对缩小的农业人口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粮食、原料和资金。同时,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和

技术创新是否能产生相等的“拉力”,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吸收率超过人口增长率，让经济逃脱令人生畏的“人口陷阱”。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移和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同步移动是以工农业的平衡增长为条件的，只有农业部门产生的“推力”和工业部门产生的“拉力”相互协调,平衡增长，才能推动二元结构的转变。费景汉和拉尼斯的上述认识,在“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中,特别是在台湾和韩国,得到了证实。

“四小龙”在历史上都曾以农业或渔业为基础,属于传统的农业国家和地区。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为基础的产业部门，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状况对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四小龙”发展农业生产的资源条件相差悬殊，其中台湾和韩国土地资源相对丰裕,1986 年,台湾有耕地 88 万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24.4%,人均耕地 0.67 亩；韩国有耕地 200 万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20%,人均耕地 0.61 亩。香港和新加坡地域窄小，可耕地极少，1984 年，香港人均耕地仅 0.018 亩,新加坡为 0.033 亩。经济起步阶段,“四小龙”都面临着人口众多与耕地缺乏的矛盾，能否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地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关系到经济起飞的速度和质量。

60 年代中期以前，“四小龙”以传统农业和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1961 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台湾为 55.76%,韩国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63.2%，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台湾为 11.29% 和 32.95%，韩国为 11.2% 和 25.6%。香港和新加坡则是经济落后的转口贸易港，劳动人口相对集中在为转口贸易服务的辅助性作业上。

从 60 年代中期起“四小龙”的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转变。产业结构趋向外向化和高度化，并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化。这种经济结构形态的转换呈现出如下特点：

(1)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1965～1985 年“四小龙”农业总产值增长 2.5～9.9 倍，除香港外，均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 3.1 倍的水平，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台湾在 1960～1985 年期间，糙米产量从 191 万吨增加到 217 万吨，增长 13.6%；水果从 30.8 万吨增加到 175.1 万吨，增长 4.7 倍；肉类从 18.4 万吨增加到 29.7 万吨，增长 61.4%；水产品从 25.8 万吨增加到 101.3 万吨，增长 3.9 倍。韩国在 1961～1986 年期间，稻谷产量从 499 万吨增加到 779 万吨，增长 56%，1975～1986 年期间，猪肉产量从 10.3 万吨增加到 45.3 万吨，水果产量从 59.5 万吨增加到 126.4 万吨，分别增长了 3.4 倍和 1.1 倍。香港和新加坡以市场为导向的城郊型农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香港 1960～1984 年期间，蔬菜产量增长 54.2%，水果产量增长 146%，猪肉产量增长 90%，水产品产值增长 4 倍。新加坡在蔬菜、观赏花卉、水产品、水果、猪肉、禽蛋产量方面也有较大增长，自给率有所提高。“四小龙”在

农业耕地面积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取得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成就，主要是依靠增加农业投入，运用农业科技,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表明,它们已从依靠土地生产力发展生产转向依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发展生产。但是这一期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呈相对下降趋势，1965 年,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 27%、39%、2%和 3%，1985 年下降到 6%、14%、1%和 1%.

(2)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成为产业结构变动的物质基础。从 60 年代起，“四小龙”相继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台湾和韩国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服务业为辅并与农业相结合的现代产业结构演变，香港和新加坡则从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服务业为主向服务业与工业混合发展的现代产业结构过渡。经过 20 多年的调整，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由 1965 年的 29%、26%、40%和 24%变化为 1985 年的 48%、41%、31%和 37%，服务业则分别由 1965 年的 44%、35%、58%和 73%改变为 1985 年的 46%、45%、68%和 62%。尤其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贡献率由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以最典型的台湾为例，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50 年代高达 32.1%，以后逐渐下降,60 年代为 12.59%,70 年代为 8.15%,80 年代仅为 6.38%。与此同时,工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从 50 年代的 24.02%上升到 80 年代的 40% 以上。服务业则一直稳定在 40～50% 的水平上。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四小龙”大约每 10 年左右完成一次转型,60 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70 年代以资本密集型为主,80 年代以技术密集型为主,90 年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将获得较快发展。三次产业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消彼长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3)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进程加快。劳动就业与产出是一国(地区)总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就业结构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即主要取决于各个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三次产业成长率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动,而劳动力有效的重新配置又会反过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就业结构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即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然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由第二产业再转向第三产业,以此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化。“四小龙”中台湾和韩国基本是循着这一次序来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1965～1987 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台湾由 46.5% 下降到 15.7%,韩国由 55%下降到 24%;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台湾

由22.3%和 31.2%上升到 43.4%和 40.9%,韩国由15%和 30%上升到 37.1%和 38.9%。工业中制造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最强。以台湾为例，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14.8%上升为1970年的 20.9%、1988 年的 34.6%。香港和新加坡由于受都市型经济和转口贸易经济的制约，经济起步阶段未形成有规模的第一产业，因而不存在劳动力在第一、二、三次产业间顺次转移的问题，但它们如今也都形成了以第二、三次产业为主的就业结构。1987 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劳动力比例，香港为2.1∶47.1∶50.8,新加坡为 0.9∶34.5∶64.6。据《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80 年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劳动比例,低收入国家为 72∶13∶15 中等收入国家为43∶23∶34,发达国家为 7∶35∶58。同期“四小龙”为15∶42∶43。这表明，它们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行列时，就业结构就已经介于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

总之“四小龙”的工业化道路独树一帜,它们在仅仅 20 多年的时间内，就逼近发达国家花费了 70～100年时间方才达到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完成了传统农业经济或转口贸易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最大限度地吸收了社会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3. 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突破了只有厂房、机器、存货等有形物质才是资本的传统观念，把由教育、保健、人口迁移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的提高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也看作是资本的一种形式。1960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中首次以‘人力资本投资”解释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金投入。1973 年,英国经济学家费雷德里克·哈比森在《作为国家财富的人力资源》一书中集中表达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生产中的被动因素，只有人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人积累资本、开发资源,组成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推动民族的发展。显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本国经济中加以有效地利用，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进展。”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完整的资本概念应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物质资本是体现在物质产品或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人力资本则是凝结在人身上主要是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也有着数量和质量的规定性。从数量上看，一个社会中劳动力

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可表示该社会人力资本的规模；从质量上看，主要指该社会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如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等。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这种投资主要有：①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支出。它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即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生产率，因而是最重要的人力投资，是形成人力资本最基本的途径；②用于保健的支出。它可以增加未来劳动力的数量，提高现有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增强工作能力；③用于劳动力国内流动支出。它有助于调剂国内劳动力余缺和充分发挥劳动者专长；④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国际间人力的流动，特别是经过专门训练的高级人才移居本国，是增加人力资本的一条非常划算的途径。通过投资所提高的人力资本可以同物质资本相互补充、相互替代。当新的特殊形式的物质资本出现时，必然产生对特殊的新型人力资本的需求；反过来，新型人力资本的增加，又扩大了对额外的特殊类型的物质资本的需求。

随着国际分工从生产的分工向科研与生产的分工发展，从制造业与初级产品的分工向高技术产品与传统工业的分工转变，各国经济学家们普遍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物质资本的多少，而是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即社会拥有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经过专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